

# 东亚政治文化 与民主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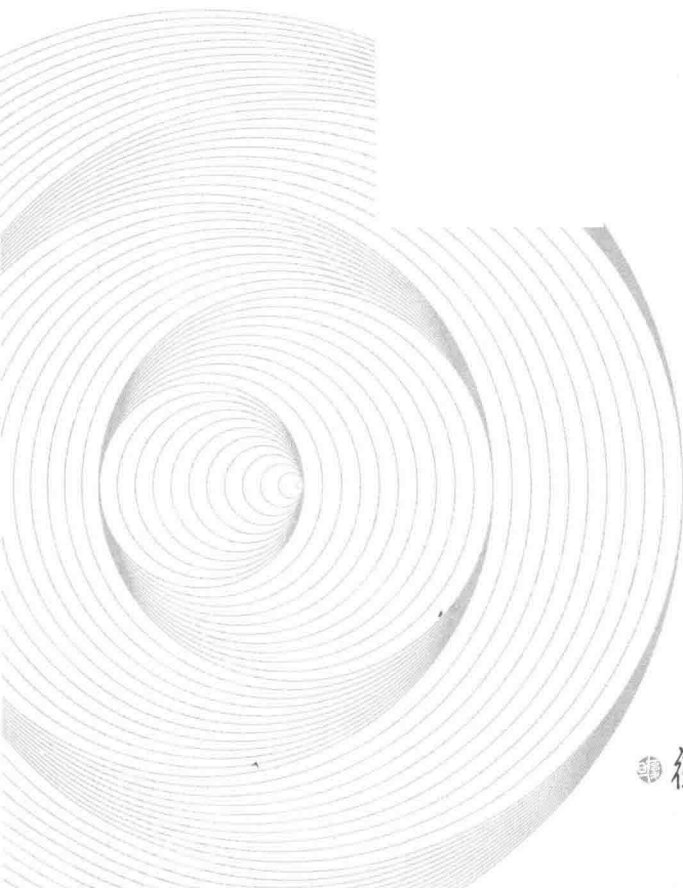
郭定平 等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东亚政治文化 与民主转型

郭定平 等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郭定平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309-11575-8

I. 东… II. 郭… III. ①政治文化-研究-东亚②民主政治-研究-东亚  
IV. ①D731.0②D73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664 号

### 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郭定平等 著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49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575-8/D · 750

定价: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特此致谢！

## 前 言

文化是有利于还是有碍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儒家政治文化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儒家文化真的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吗？一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走上了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对此该作怎样的解释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讨论就是本书的主题。换言之，本书就是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的初步成果。

我对政治文化的兴趣可谓由来已久。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复旦大学开始学习和研究政治学以来，本人就一直对此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兴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热”，很多青年学子成为“文化迷”，我也身在其中，深受影响。在此背景下，复旦大学成为当时文化研究与讨论的中心之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三期出版“文化研究专号”，1988 年第三期出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专号”，推动了中国文化研究与讨论的深入开展。正是在那一期“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专号”中，王沪宁教授发表了《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一文，让我对政治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并着手进行一些探索。

在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我感觉自己明显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出现了一些思想的转变。最初，我特别重视思想启蒙，在上海的《社会科学》1989 年第 6 期上发表了《启蒙运动之比较研究》，认为启蒙运动是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在《南京社联学刊》1989 年第 3 期发表了《论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

在讨论和批判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劣根性的基础上,提出要通过加强民主教育等途径,改造和重建中国政治文化,培养和塑造中国人的民主意识。随后,在经历了激进政治运动的挫折之后,我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开始转向一种内源发展观,在《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发表了《论中国民主政治的内源发展道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政治精神并不与现代民主价值相违背,提出要注重开发、转换和利用传统文化,发掘有益和有用的精神文化资源,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近年来,在反思自己的政治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我逐渐倾向于一种更加全面和综合的政治文化发展路径。

从2003年起,我连续多年参加了东京大学猪口孝教授(现为日本新潟县立大学校长)主持的“亚洲晴雨表(Asia Barometer)”调查研究项目,与东亚各国政治学者一起研究和讨论政治文化问题,并负责中国部分的报告撰写。2006年10月我在复旦大学组织召开了“文化与民主:东亚政治发展经验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我主编了《文化与民主(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入了我撰写的长篇论文《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种新的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认为内源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变迁同时并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东亚政治文化的变迁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本书就是根据这一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要分析对象,对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进行的一项研究。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是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研究导论,分析了民主转型与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背景和特点,总结了东亚儒家政治文化与民主的相关研究与讨论,提出了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的宏观分析框架。第二章主要考察了中国儒家政治文化的起源、发展与特点,以及儒家文化在日本、韩国的传播与影响。第三、四、五章分别从内源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变迁三个维度对中

国、日本、韩国的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进行了探讨。第六章是对东亚政治文化发展与政治文明复兴的总结与展望。

本书是在我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亚地区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结项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和补充而成。全书内容的具体分工是：郭定平负责全书的总体框架设计和章节安排，并具体撰写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六章；宋道雷、李学楠和郭定平分别负责撰写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初稿；束赟、张冬冬和张建伟分别负责撰写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初稿；第五章的第一节由王正绪撰写，第二节由郭定平和马华灵撰写，第三节由姜锐瑞撰写，第四节由郝诗楠撰写；最后由郭定平修改和统稿。

值得说明的是，本书的部分章节已经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例如，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来自郭定平著《论民主转型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和郭定平著《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文化与民主（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来自张冬冬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近代民主转型与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日本研究集林》2013年下半年刊）和张建伟著《传统儒教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困境——以韩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为视角》（《东疆学刊》2013年4月）；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来自姜锐瑞著《现代日本政治文化的后现代转向》（《日本研究集林》2014年下半年刊）和郝诗楠著《民主制度与民主政治文化的生成：韩国的案例》（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六章的部分内容来自郭定平著《论东亚政治文明的复兴》（《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我们非常感谢以上各个杂志编辑部和出版社允许我们在此收录相关内容。

在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个人和组织的关心、支持与帮助。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为这一课题立

项并提供支持,参与项目立项评审的各位专家和学者认可和同意了该项目。参与该项课题的所有学者组成一个强大的课题组,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具有学术热情和奉献精神的快乐团队,我本人在与大家的交流中深受感染,获益匪浅。在项目的结项评审阶段,各位专家在对项目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对我们修改完善书稿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慷慨资助,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重视和关心,特别是责任编辑孙程姣女士的负责态度、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学术生涯中,家人的关心和支持一直是我们的强大后盾和不竭动力。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书中如有任何问题,一概由作者负责。祈望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郭定平

2015年6月10日



# 目 录

## 第一章 导论 /1

- 第一节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 /2
- 第二节 儒家文化与民主的关系 /20
- 第三节 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28

## 第二章 东亚儒家政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57

- 第一节 中国儒家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特点 /57
- 第二节 日本儒家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71
- 第三节 韩国儒家政治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87

## 第三章 东亚政治文化的内源性发展与民主转型 /99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要素 /99
- 第二节 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特征 /120
- 第三节 韩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资源 /137

## 第四章 东亚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民主转型 /146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的主线与特征 /146
- 第二节 日本近代国权与民权的变奏 /165
- 第三节 韩国儒家政治文化的危机与变迁 /186

**第五章 东亚政治文化的适应性变迁与民主转型 /203**

第一节 东亚现代化与价值观变迁 /203

第二节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与文化变迁 /223

第三节 当代日本政治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特征 /244

第四节 当代韩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倾向与民主信念 /264

**第六章 东亚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复兴 /284**

第一节 东亚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兴衰 /284

第二节 东亚经济发展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成 /290

第三节 东亚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政治文明建设 /302

第四节 东亚政治文化变迁与民主转型展望 /310

##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的主题是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问题。由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从比较研究的兴趣点和有效性出发,我们主要关注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重点研究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民主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一直受到广泛重视。在当代政治学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政治学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尽管政治文化的定义名目繁多,人们对它的理解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相关研究精彩纷呈,但是自从阿尔蒙德和维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展大规模的跨国政治文化调查研究并出版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首部经典著作《公民文化》以来,政治文化研究主要就是探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在当今全球民主化的时代,文化与民主的关系就成为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在 20 世纪后期大范围的民主转型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再度成为政治学研究关注的热点,并出现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

东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继战后创造经济奇迹之后,又创造了民主转型的政治奇迹,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些新兴民主国家努力巩固各自的民主体制的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东亚民主转型的成功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东亚传统文化阻碍民主政治发展的思维模式产生了直接冲击,并促使人们重新反思文

化与民主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本章将首先通过分析民主转型与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把握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前沿问题和基本趋势;其次,回顾和总结关于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与讨论,形成明确的问题意识;最后,在对政治文化与民主,特别是儒家文化与民主的相关研究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建构本项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

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探讨人们对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的认识、态度、情感与评价,重点关注政治行为的价值与心理层面。政治文化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高潮之后就屡屡受到各类批判和攻击,并曾经一度陷入衰落和沉寂。在20世纪后期民主转型浪潮席卷全球的过程中,民主与文化的关系重新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复兴。这一重要倾向不仅推动了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对促进全球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一、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文化问题

民主政治研究与文化研究虽然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很多人都有关于民主与文化关系的精彩论述,但是,在政治科学意义上对民主与文化的关系进行系统探讨的政治文化研究则是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真正形成潮流,并进入政治学术殿堂。1958年,塞缪尔·比尔和亚当·乌拉姆合作主编出版了《政府的模式》一书,他们在此书中就把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基本因素之一进行了考察。同年,爱德华·班菲尔德撰写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问世,作者研究了意大利南部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认为意大利南部之所以经济和政治上落后,是因为这个地区盛行的

非道德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sm)抑制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和阻碍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sup>①</sup>。对于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进行系统和科学研究则首推阿尔蒙德和维巴于1963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随后,派伊与维巴合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1965)、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66)等著作相继问世,把政治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向了高潮。

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堪称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是探讨文化与民主关系的经典名著。作者开宗明义就指出:“这是一种关于民主政治文化以及维持这种政治文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程序的研究。”<sup>②</sup>阿尔蒙德和维巴在该书中以大量的实证调查资料和数据为基础,比较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文化,提出了地域民(愚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的经典分类体系,讨论了政治文化与民主发展的复杂关系。他们认为,每个社会都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但是,只有当参与型的公民文化占主导地位,并与地域民文化和臣民文化有一个较为平衡的混合,才能达到实现民主的最佳文化条件。正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所说:“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还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公民文化似乎特别适合于一个民主的政治系统。它不是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唯一形式,但它似乎与一个稳定的、民主的系统最为和谐。”<sup>③</sup>在阿尔蒙德、维巴、派伊等的影响下,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各种成

<sup>①</sup> 佟德志主编:《比较政治文化导论——民主多样性的理论思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6页。

<sup>②</sup>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美]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586页。

果大量涌现,在政治科学的百花园里争奇斗艳。

但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研究的高潮好景不长。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军事政变频发、政局动荡,经济与政治危机四伏,权威主义体制盛行,民主发展出现了低潮。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中理性选择理论模式成为主导范式,于是政治文化研究遭到诸多贬斥和攻击,并一度走向衰落和沉寂。正如比较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所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领域未出现任何新的或重要的突破。大部分学者继续将政治文化用作一个与其他因素并列的、重要的解释性因素,但是政治文化作为激动人心的新概念的地位已经失去了。”<sup>①</sup>根据威亚尔达、罗斯等人的分析和整理,针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批判意见主要包括:(1)政治文化是作为一种“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y)”而使用的,就是只要人们找不到其他原因来解释某一政治现象,就会将其归因于政治文化;(2)政治文化的概念过于含糊和笼统,似乎无所不包,与其他概念的边界不明确,如果在解释某一现象时,把什么都说成是政治文化,那就等于什么都没说;(3)政治文化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因此有人指责它忽略了对制度结构的研究;(4)早期政治文化方面的文献无一例外都关注国内的价值与影响,因此有人批判它忽略了国际影响;(5)由于在早期政治文化研究中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文化才被认为是“最发达”“最现代”,因此有人批判政治文化研究带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6)由于早期政治文化研究只选取某一时点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有人认为它是一种静态的分析,缺乏动态观察;(7)政治文化研究注重考察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有时文化内的差异可能是巨大的,文化同质性观念往往夸大了一个特定群体共享的东西,它让群体内差异

---

<sup>①</sup>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最小化,而让群体间差异最大化<sup>①</sup>。

尽管面对众多责难和批判,政治文化研究并没有消亡。随着全球化的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和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调查项目的实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复兴,并很快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sup>②</sup>。开启这一新时代的仍然是两位老将阿尔蒙德和维巴,他们在1980年对其开拓性的著作进行了修订再版,并题名为《公民文化新论》(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在新版本中,他们不仅回应了过去将近二十年针对他们的理论与方法提出的批评,而且结合新的资料对原来五国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更加精确的分析。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新版本出版之后,许多著名政治学家开始对政治文化进行了大量新的研究。例如,塞缪尔·亨廷顿1981年出版《美国的政治:不和谐的承诺》一书,他在此书中不再像以往那样只关注政治制度,而是转向关注政治文化因素。在1987年的一篇讨论政治发展的文章中,亨廷顿就提出了关于发展的文化问题,并明确指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量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文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要求政治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sup>③</sup>因此,在1993年出版的研究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的专著中,亨廷顿在考察民主转型的原因时就对政治文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把民主价值的广泛普及导致的权威体制

①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2页;[美] 马克·霍华德·罗斯:《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文化和身份》,载[美] 马克·利希巴赫、[美] 阿兰·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83页。

② 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的分析,详细参见[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8页;丛日云、王辉:《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政治学研究》(北京)2000年第1期,第28—35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357页。

的合法性危机的加深列为首要原因；在分析民主巩固时则专门论述了“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sup>①</sup>。

在这种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潮流中，最早提出“政治文化复兴”概念的是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他在1988年12月出版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长篇论文《政治文化的复兴》，明确提出“现在是矫正社会分析中的偏向的时候了”，矛头直指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以经济变量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模式，认为此类分析模式将文化因素贬低到了不符合实际的程度。在对欧洲晴雨表舆论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资料进行系统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英格尔哈特认为：经济因素当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一切；不同的社会具有显著不同的独特的政治文化，这些文化差异具有相对持久性，但并不是持久不变；它们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与民主制度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密切联系<sup>②</sup>。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政治文化的复兴得到更多学者的确认、响应和大力推动，从而使政治文化研究重新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道靓丽的风景，不仅学者队伍蔚为壮观，而且研究视野大为拓展，研究理论也不断创新。

## 二、民主转型与政治文化研究的拓展

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是多种因素影响和推动的结果，其中除了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影响显著减少和政治科学研究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弊病日益显现之外，全球范围的民主化浪潮可以说是一个主要背景因素。当代政治转型浪潮最早是1974年在南欧发生的葡萄牙独裁统治的垮台、希腊军人政权被文职政府取代以及1975年西班牙弗朗哥36年独裁统治的终结。在拉丁

<sup>①</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55页、第312页。

<sup>②</sup> 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4, December 1988, pp. 1203-1230.



美洲,从1978年巴拿马通过总统间接选举过渡到文官政府开始,到1990年海地军人独裁政权倒台,拉美14个军人执政的国家都先后实现了所谓“还政于民”的转变,被称为“80年代拉美的民主化进程”<sup>①</sup>。在苏联东欧地区表现为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共产党政权的下台,以及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选举政治的开始。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则集中体现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权威主义统治体制受到冲击后通过政治改革逐渐向自由民主体制过渡。在非洲和中东,虽然存在一些反复和曲折,民主转型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了重大进展。在这样相对集中的时期出现如此大范围的民主化制度变迁,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研究民主与文化关系的兴趣,也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研究案例。罗素·达尔顿认为,当前全球范围的民主化浪潮,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命题,例如,在多大程度上从对民主政治有利的文化因素上可以判断出这个地区的民主前景?因此,“文化规范与民主相适应的深度和广度,可能是解释世界各地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应该有能力来检验政治文化理论,使之成为一个有用的预测工具。大量的国家正处在政治转型的进程之中,我们可以从中考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适性是如何发展的”<sup>②</sup>。在全球范围的民主转型与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式转向的影响与推动下,政治文化研究得到了很大拓展,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地域范围拓展到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早期政治文化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对象是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少数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即便存在一些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研究,多半只是一鳞半爪,或是浮光掠影,既不全面也不深刻。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

① 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② [美]罗素·达尔顿:《比较政治学:微观行为视角》,载[美]罗伯特·古丁、[美]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王洛忠、任丙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80—485页。